

## 讀冀淑英先生《〈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

張麗娟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的解讀，及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稿與“徵求意見稿”的比較，論述了冀淑英先生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過程中的傑出貢獻，並以飽含情感的筆觸描述了冀先生的深厚學養和對古籍善本的極深厚感情。

**關鍵詞：**冀淑英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1991年，我畢業分配至國家圖書館（當時名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善本組工作。其時，冀淑英先生與丁瑜、沈燮元、陳杏珍等先生還在圖書館辦公樓四樓的總目辦公室，進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定稿工作。現在的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學姐，也在那裏協助工作。後來，定稿工作漸近尾聲，工作人員也漸次分散，總目辦公室移至圖書館一樓善本特藏部辦公室斜對面，惟冀、陳二先生堅守。當時我對先生的工作不甚了了，每日祇見先生瘦小的身軀，從舞蹈學院家中蹣跚走來，再蹣跚而去，腰身一日一日地彎下去，再也無法挺直。到後期，先生實在走不動了，就由圖書館每天派車接送，堅持工作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完稿。每次因善本組事務，或自己有問題請益，走進先生的大辦公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無數個高高滿滿的目錄櫃，那是全國各地彙集而來的善本目錄卡片。目錄櫃之間，是個老舊的大辦公桌，高高的一堆卡片目錄與材料袋中間，先生埋首伏在書案上，因目力欠佳，需將眼睛緊貼書案，小小的身軀更顯佝僂。如今每次想起冀先生，浮現腦海的就是那個瘦小身軀伏案工作的情景。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完稿至今已有十幾年，其間我從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轉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這部書目在我的學習和工作中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無數次的使用，使我深感這部書目中蘊含的學術價值和前輩學者在其中付出的心力。近日重讀先生《〈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一文，回想當時諸位先生辛勤工作的情景，心中頗多感慨。因結合自己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點滴體會，不揣淺陋，草成此文，以為冀淑英先生逝世十週年之紀念。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在周總理指示下，動員全國圖書館古籍編目力量，從1978年始至1995年完稿，歷時十八年時間完成的一部全國古籍善本總目錄，由顧廷龍先生

任主編，冀淑英、潘天禎先生任副主編。1995年6月全部定稿工作完成後，冀淑英先生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一文，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始末及編纂過程中所遇諸問題，發表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年第2期，1996年12月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收入，2004年出版的《冀淑英文集》亦收入此文。

冀先生在《後記》中，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總結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年至1980年兩年間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各地進行善本普查，各藏書單位抓緊整理編目；一方面編委會組織討論分類法、著錄條例及各地巡查指導藏書單位編目工作。第二階段為1980年至1983年間的彙編工作，組織數十位圖書館古籍專家，將全國七百八十一家單位報送的十三萬八千餘種目錄卡片，按類彙編，分經、史、子、集、叢五個編輯室進行審校，形成油印本“徵求意見稿”。第三階段為定稿工作階段，從1983年始至1995年，以油印本“徵求意見稿”為基礎，逐條審定款目，核查各項著錄，編訂排序，完成全稿。三個階段說起來簡單，全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藏書編目基礎不同、善本收錄條件有異，編目中書名、作者、卷數、版本等著錄各有參差，將十幾萬種書目卡片彙聚一處，相同版本合併款目，不同版本分條著錄，形成可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編排有序的總目錄，其工作之艱巨繁雜，不歷經其事者恐怕很難體會。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除主編、副主編、顧問等外，參加彙編工作人員四十人，參加審校工作人員十七人，參加定稿工作人員包括丁瑜、任光亮、江凌、沈津、沈燮元、宮愛東、陳杏珍七位。書目前期工作情形，筆者無緣得見，後期在北京進行定稿工作的，如冀先生、丁瑜先生、沈燮元先生，都上了年紀，陳杏珍先生年歲較晚，而體質虛弱，身有頑疾。他們克服種種困難，為了更好完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定稿工作，四處奔波，埋頭苦幹，其中甘苦，實不足與外人道。我還記得那幾年裏，南京圖書館的沈燮元先生常年住在北京圖書館的小招待所，每天吃食堂，對北方的飲食不習慣。當時我住在招待所旁的單身宿舍，一次先生命我去市場買來小菠菜，用煤油爐煮一煮拌一拌請他吃，老人家興高采烈地邊吃邊講南方的小菠菜多麼嫩多麼好，說北方的菠菜太老嚼不動。當時他年近七旬，為解決定稿中的疑難問題，時不時地早出晚歸跑各圖書館去看書，常常聽他講又去了哪裏，看了哪些書，解決了什麼問題。各位先生就是這樣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完成了周總理交代的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為後人留下了一部高質量的古籍善本聯合目錄，摸清了我國古籍善本書的家底，並以其編纂的學術性、準確性、全面性，成為版本目錄學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座豐碑。

冀淑英先生作為副主編，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的各個階段，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第三階段歷時最久，工作細緻繁重，先生躬親竭力，矻矻終日，獻力尤鉅。

筆者初來國圖那幾年所見的先生，每日風雨無阻、埋首伏案所做的，就是這一階段後期的定稿工作。

冀先生在《後記》中這樣描述第三階段的工作情況：“定稿工作於一九八三年八月由主編、副主編、顧問和工作人員共八人集中上海開始。根據彙編工作和審片實踐中

取得的經驗，開始之前再次討論研究了收錄範圍和著錄條例，並作了補充，建立定稿制度和組織人員分工。從經部開始，以油印本‘徵求意見稿’為基礎，參考全國各藏書單位和專家們寄回的意見，逐條款目進行審定。審定過程中，仍儘量利用函調徵求書影，據以解決問題。審校中遇到必須看書解決的問題，按地區集中一批，組織外出看書，先後在浙江、山東、京、津、滬三市的重點單位，查對原書上千種，從而改正了很多款目的著錄。定稿中，由副主編統一審查各類的著錄和每類中卡片編排順序，編成初稿，再由主編核定。這項工作需要深入細緻，問題纔能適當解決和少出失誤；不足之處是藏書單位分散，在人力和時間上都不可能多去各地看書，有的問題只能通過函調或從文獻資料中獲得解決，從而訂正了某些書名、作者、版本方面的著錄。”

## 二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第二階段完成的油印本“徵求意見稿”，因為有行款版式的記載，可以提供許多參考信息。筆者在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過程中，也常常參考“徵求意見稿”。不過，“徵求意見稿”畢竟是徵求意見稿，其中大量著錄在最後定稿中都進行了修訂，主要表現在書名、卷數、著者的確認，版本項的修訂，條目的增刪，分類、排序的調整等。這些修訂，是書目編纂工作第三階段即定稿工作階段中，包括冀淑英先生在內的各位定稿工作人員工作的成果，反映了編纂者的目錄思想與善本觀，是前輩學者深厚學養與辛勤勞動的結晶。以下略舉定稿對“徵求意見稿”修訂之例，以見定稿階段諸位先生的工作內容。

### 1. 書名、卷數、著者的確認

書名的修訂，如“徵求意見稿”經部禮類 349 號“重言重意禮記二十卷”，宋刻本。定稿改為“禮記二十卷”。按此本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卷端題“禮記”，為經注附釋文本，散入陸德明音義，並有“重言”、“重意”等內容，北大原編目自行加入“重言重意”數字。實際上此本並無“重言重意禮記”題名，“徵求意見稿”未察，定稿改依卷端所題。

卷數的修訂，如“徵求意見稿”經部易類 22 號“周易十卷附略例”，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遞修本。定稿改為“周易九卷略例一卷”。按《周易》經注本包括正文九卷及王弼撰《略例》一卷，其中《略例》有的版本刻作卷十。前人有著錄作十卷者，十卷中乃包括《略例》一卷而言。著錄作《周易》十卷又附略例一卷，顯然是錯誤的。又如“徵求意見稿”經部書類 319 號“尚書通義二卷”，邵懿辰稿本，定稿改為“尚書通義口卷”，“存二卷（六至七）”。此書原卷數不詳，但現存卷六至七，顯然原書卷數在七卷以上，原作二卷者誤。

著者的修訂，如《後記》中所舉《愛經居經說》稿本，“徵求意見稿”列經部群經總義類 250 號，作者為“清黃家橋”，定稿中經復核原書，並查考文獻，考證其作者當為黃家橋之父黃以恭，因改正。又如“徵求意見稿”經部書類 157 號《書經直指》六卷，未著撰者，定稿增入“明徐善述撰”。

## 2. 版本的審定

定稿改正了“徵求意見稿”部分條目的版本著錄。如經部易類 31 號北大藏本《周易兼義》，北大原編目作“宋刻元明遞修本”，“徵求意見稿”同。按此本實為元刻明修十行注疏本，舊作宋刻誤，定稿已改為“元刻明修本”，與國圖、開封市圖書館藏相同版本合併為一條。又“徵求意見稿”經部春秋類 65 號湖南省圖書館藏《京本點校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作“元刻本”，定稿改為“宋刻本”。“徵求意見稿”經部春秋類 133 號北大藏本《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作“宋刻元修本”，定稿改為“元刻本”。“徵求意見稿”經部四書類 112 號北大藏本《孟子集注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作“元刻本”，定稿改為“明刻本”。此類宋元版書版本年代的訂正，關係重大，需深通版本鑒定之學、且需調閱原書仔細審視，多方查考資料方可為之，最可見定稿者功力。

“徵求意見稿”中部分條目版本著錄不準確或有缺略，定稿時亦加修正補充。如“徵求意見稿”經部禮類 672 條《禮箋》“清嘉慶三年刻本（清孫詒讓批）”，定稿改為“清乾隆五十九年方起泰、胡國輔刻嘉慶三年印本（清孫詒讓批）”。又如“徵求意見稿”經部禮類《周禮注疏刪翼》有“明崇禎十二年葉培恕昆山縣署刻本”，又有“明崇禎十二年天德堂刻本”。定稿將後本改為“明末天德堂刻本”。按天德堂本北大有藏，卷前有崇禎十二年王志長自序，內封面刻“天德堂梓”，故舊編目作明崇禎十二年天德堂刻本。實際上王志長自序有云“邑侯臚仙葉公退食之際，過予齋，每見未嘗不稱善。客夏書成，相與商略而厘正之，遂損棄壽之梓”，可知崇禎十二年葉培恕刻本為此書初刻，天德堂本當為其後的翻刻本，定為崇禎十二年刻顯然有誤。其本不避清諱，定稿將其刊刻時間定為明末，當得其實。

又如“徵求意見稿”經部易類 184 條北大藏本《誠齋先生易傳》“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定稿著錄作“明嘉靖四十二年張時徹刻本”。“徵求意見稿”經部禮類 73 條《周禮集說》“明成化張瑄刻本”，定稿改為“明成化十年張瑄刻本”。這類增入刻書者或刻書年的條目，在定稿中俯拾皆是，這是對原編目的細化工作。也有的“徵求意見稿”著錄有具體刻書年與刻書者，而定稿中改為籠統的“明刻本”，看起來似是倒退，實際上反映了定稿者對該版本不同前人的鑒定意見。如“徵求意見稿”史部雜史類 301 條《貞觀政要》“明成化刻本”，定稿專家認為其刊刻年代到不了成化，因改為“明刻本”。

## 3. 條目的增、刪、合併與分析

條目的增刪，有的可能是“徵求意見稿”的疏漏，有的是對善本標準的不同把握所致。如“徵求意見稿”中的一些流傳較多、版本並不稀見的清代刻本和清抄本，定稿將其刪除。也有條目增加之例，如經部小學類鄭樵注《爾雅》三卷，“徵求意見稿”著錄兩本，一為清康熙四十年鄭定遠刻本，一為清初抄本。定稿除此二本外，又增入一部國圖藏“元刻本”。又如經部禮類《禮書》，“徵求意見稿”有“明末張溥刻本”，定稿在此條之後，又增入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張溥刻本（清孫詒讓校）”一目。又如經部群經總義類《黃四如先生六經四書講稿》，“徵求意見稿”著錄北大藏“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定稿將此本版項修訂為“明嘉靖二十七年黃文炳刻本”，又在其下

增入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黃文炳刻清康熙二十二年黃雯重修本”，為“徵求意見稿”所缺。

條目的合併與分析，乃因原作不同版本的條目，後鑒定為相同版本，遂合併為一個款目；或原作相同版本合併一條處理的，後發現其為不同版本，遂分成不同款目。此類工作，需調閱各家藏本，比較鑒別，依靠的是定稿者長期版本實踐磨煉出的一雙慧眼。條目合併之例，如經部詩類《歐陽文忠公毛詩本義》一書，“徵求意見稿”列八個款目，包括“明刻本”、“明末刻本”、“明抄本”等，定稿除兩部明抄本各列一目外，其它六條合併為一條，作“明刻本”，說明這六本實為相同版本。又如“徵求意見稿”經部禮類《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列宋刻本兩種，一為上海圖書館藏本，存卷1，3，7-12；一為北大藏本，存卷2，4-6。兩本卷尾相同位置皆鈐“白門居士”印，書衣簽題完全一致，說明兩本為一書散出者，定稿合併為一個款目。條目析出之例，如“徵求意見稿”經部小學類1460號《詩韻輯略》“明天啟二年刻本”，清華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三家藏，定稿將此款目析為兩條，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仍為“明天啟二年刻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改為“明刻本”，說明其為另一版本。

#### 4. 分類與排序

古籍目錄的分類與排序，可以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是我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徵求意見稿”已經在分類編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分類方面有未妥之處，類中排序也來不及仔細斟酌。定稿者在這方面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進行調整。

分類方面，如《養正圖解》，“徵求意見稿”排在史部傳記類，定稿改入子部儒家類。《宋元學案》，“徵求意見稿”排入子部儒家類，定稿改入史部傳記類。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徵求意見稿”排入史部傳記類，定稿改入子部雜家類。還有的一部書原分散入兩類，如《新刻世史類編》，“徵求意見稿”史部編年類458、459號著錄“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與“明書林張起鵬刻本”兩目，史部史抄類172號著錄“明書林晏少溪刻本”一目，定稿中將三本統一歸入史部編年類。

排序的調整更是隨處可見。大的調整，如經部詩類中的《韓詩外傳》等相關條目，“徵求意見稿”排在毛詩正文與毛詩傳說之間，頗為不類，定稿將這些條目全部移至詩類之末，排在齊詩、魯詩之後，符合詩經傳授源流與學術發展脈絡。經部春秋類中《春秋繁露》相關條目，“徵求意見稿”排在“公羊”之末，定稿將其整體移後，附於春秋類之末。經部書類中的《禹貢》、《洪范》等分篇之屬，“徵求意見稿”分散在《尚書》傳說之間，定稿將其提出置於書類之末，等等。個別條目的調整，如經部春秋類有國圖藏《春秋經傳》宋刻本、華東師大藏秦鏤刻九經本《春秋》，皆左氏傳，“徵求意見稿”誤將兩本置入“春秋總義”，定稿則移至“左傳”部分。經部禮類《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宋刻本，在“徵求意見稿”中，排在《周禮注疏》、《禮經會元》、《太平經國之書》、《周禮句解》等書之後，實際上此書為《周禮》經注本，附有陸德明音義及少量重言、重意內容，定稿將此本前移至《周禮》經注本之間，較為合理。至於集部宋、元、明、清別集各類，需依作者年代先後編排，定稿者逐一核

查作者生卒年、中進士年，或主要活動年代、成書年代，其工作量之巨大可想而知，其中調整更是不計其數。

### 三

以上列舉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稿對“徵求意見稿”的修訂，只是筆者學習工作中偶及的小小例子。這些修訂，有的是各館工作人員或各地專家學者反饋回來的信息，有的是參與定稿工作的專家學者親身到各館調查原書所得，有的需要查考歷代著錄、文獻資料，考證辨析。分類調整與款目排序方面，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凝聚著無數圖書館古籍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更是包括冀淑英先生在內的全體編纂人員學識、智慧和辛勤工作的成果。

2003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編成索引，影印出版。2005年，綫裝書局出版了《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以“徵求意見稿”為底本，排印行世。兩書皆不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諸先生名。在筆者所工作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閱覽室的書架上，這兩部書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並置一處，往往引來老師與學生的疑問，不知該以何本為準。即專研古代文史者，也不大明白它們之間的原委關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索引遲至2009年纔出版，而新出版兩書的索引的確方便好用，這就導致使用“徵求意見稿”者多，而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稿的讀者反倒不及了。如上所述，“徵求意見稿”同樣是顧廷龍、冀淑英先生為首的圖書館古籍工作者辛勤勞動的成果，其中有大量信息可供參考，但它只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可以配合定稿參考使用，而不宜作為學術研究中的確切依據。如今“徵求意見稿”泛濫的現象，對讀者、特別是對不明原委的年輕學子，極易形成誤導，思之實令人惋惜心痛。

冀淑英先生學養深厚，為人謙和，對古籍善本有極深厚的感情。記得1997年先生為善本部同事做了十幾期講座，從內閣大庫到海源閣、鐵琴銅劍樓，從楊守敬到傅增湘、周叔弢，先生對北圖善本書入藏源流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似乎每部書都刻在她的腦海裏。講到海源閣藏書遭土匪劫掠，善本書拿來點火用，先生激動得聲音都在顫抖，滿座扼腕嘆惜。講到周叔弢、鄭振鐸等藏書家對善本書的珍愛、搶救並化私為公，先生語氣中飽含敬仰與感情。先生一生與古籍善本為伴，經眼珍善本無數，而為人低調，不好為人師，撰作文章也不多。她的學識、才智和心血，凝聚在國家圖書館的古籍善本收藏中，凝聚在一張張用鉛筆寫就的目錄草片裏，凝聚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西諦書目》、《自莊嚴堪善本書目》等目錄著作中，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更是先生畢生學識經驗與十數年精力心血之所聚。今重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一文，追憶先生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倉促成文，雖不足以表彰前輩學者功績於萬一，庶有助於年輕學子明各本之原委，而有所適從。並以此文，寄託對先生的無盡崇敬與哀思。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圖書館）